
目

錄

前言	1
般咸道、文咸街與第三任港督	5
一個港督幾種譯名	5
英商入城 先禮後兵	9
般咸緩和仇英局勢	16
“九九九年期”的典故	19
廢除拍賣稅 改徵牌照費	24
“太平紳士”的緣起	25
文咸街與“南北行”	29
又名“紅毛嬌街”的吉士笠街	33
“紅毛嬌”雲集巷口	33
郭士立是一名“中國通”	36
林則徐初次接觸的西方人	40
話說中區“長命斜”	46
奧卑利街是香港法制發展的見證	46
第一任裁判官威廉·堅	51
高等法院審理的首宗案件	55
警署之內有監獄	59
“長命斜”此名何來？	63
公開行刑 安定民心	66
“長命斜”的其他傳說	70

“二奶巷”（安和里）的趣聞	80
紅牌阿姑與“二奶巷”	80
弄璋竟獲一條街	87
“公白行”究竟經營甚麼？	97
議員陳言遏止鴉片專賣	101
孫中山先生頒令禁烟	104
名流利希慎遭刺殺	108
“中國街”易名“萬宜里”	110
旭龢道與羅旭龢的生平	113
有辯派和無辯派	113
香港音響業的始祖	116
英王子觀看“番鬼佬”粵劇	119
“銀舌”一動 英廷匯款三千萬	122
對話勝於對罵	126
分層繳納差餉的提議	128
男女可以同台演戲嗎？	130
馬師曾赴穗請來譚蘭卿	135
三院聯稟組織男女戲班	137
籌辦全港首次校際運動會	140
各界踴躍資助校際體育盛會	146
羅旭龢周旋於日偽之間	154
磯谷廉介被要求作合理解釋	160

雪廠街的滄桑	164
香港開埠初期的地理環境	164
人造冰與天然冰的“減價戰”	168
曾經是港島交通的中心地帶	173
電話通訊業的發展	177
股票經紀的活動場所	181
股票法案挽回港人信心	184
三年壽命的伊利斯指數	188
華人經紀控制股票市場	192
麥當勞道和孖沙街	197
賭風難禁 政府乾脆介入	197
“義祠醜聞”促成東華醫院創辦	205
首次發行香港銀元	209
孖沙街原是香港的金融中心	212
伊利近街是著名的泥街	216
港督寶靈曾派兵攻打羊城	216
兩廣總督葉名琛流落印度	222
額爾金接收南九龍半島的經過	226
在霧裡高懸的盧吉道	229
盧吉倡辦香港大學	229
香港八景之一——“天橋霧鎖”	234

夏慤道與海軍船塢的變遷	237
昔日金鐘道是“樽頸地帶”	237
海軍船塢擁有工人近萬	241
現代技術在此萌芽	245
夏慤發行單面輔幣	250
非法貨幣合法流通	253
全力穩定香港物價	256
黑市外匯也有存在意義	260
蔬菜統營使菜農得益	263
宣佈中區填海計劃	269
架起首座“汽車天橋”	271
“公共小巴”的誕生	276
哄動一時的“劉炳案”	282

SAMPLE

香港街道的名稱看似雜亂無章，其實它們都各有起因，而且離不開“地名學”的範疇。因此，研究起香港街道命名的由來，少不免觸及許多關於香港歷史的故事和街坊傳說。

查中國各大城市的街道，亦有一套命名的法則。有些街道以人名命名，有些街道以官衙所在地命名，有的街道名稱源於古代城門的位置，有的則冠以花草樹木的名字。其中，也有不少街道是用吉祥句，或以其所在範圍內最特出的行業名稱命之。在香港，同樣有自己的街道命名法則，只因這裡是華洋雜處之地，一些街道也許先有英文名字而後才有中文譯名，但由於不同的年代或各異的社會背景，加上譯者的翻譯水平有所差別，遂出現了好些近似的街道名稱。舉例說，港島中區既有文咸街，又有般咸道（曾一度被稱為“般含道”）；“文咸”和“般咸”，實際上是同一人的名字，只不過是異譯，才會有一字之差罷了。至於那位既稱“文咸”又稱“般咸”的人，正是香港第三任總督，他精通中文，並給自己擬了一個很中國化的名字——文翰，可是香港早期的翻譯人員卻未有留意，才把本來謂之“文翰”的兩條街道，先後均譯成與此有出入的不同街名。

香港一些街道除了在路牌上標明正式的路名外，亦有被坊眾慣稱的俗名。街道的俗名亦即街道的綽號，是人們於日常生活中有見及該處的某種特徵或現

象而賜給它的。類似情況，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香港也不例外，譬如本書提及的“二奶巷”、“紅毛嬌街”、“長命斜”和“南北行街”等等，均為香港中區部分街道的俗稱。街道的俗名與正式名稱一樣都有其來源。如果我們找到這個源頭，街名產生的來龍去脈不但一目瞭然，而且個中的內涵或有關掌故，當能令人發出會心微笑。

香港早期若干街道，是由該處發展商命名的，這點希望讀者研究時加以留意。香港昔日的建築物，主要仗磚瓦木石等材料建造。至於樓宇的形式，則因發展商、業主和租客大多是中國人，而自然地帶有中國村屋的風格。其時，樓宇的高度一般不會超過三層（多為兩層高的房屋），發展商必須購入大幅土地，興建數以十幢計的屋宇，並且將之售出才易謀利。由於在同一地方同時建造多幢房屋，便需要撥出通道以利於住客進出，這便形成所謂私家街道。既然這類街道屬於發展商的私有土地，那末由發展商命名是合乎情理的，而發展商通常愛用吉祥字句作為私家街的名稱。經過百年多變遷，香港有些私家街道內的樓宇已更易業權，並改建成層數較多的大廈，原來的私家街道亦漸被政府收回。今天，我們很可能從表面上誤以為這些街道的名稱是由政府命名的。事實上，假如不尋根問底，追溯地方歷史，便很難將之查考出來。

香港有些街道是用華人名字命名的，但香港上流

社會中的華人都有一個英文名字，因此，以這階層華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往往使人以為其中人物是一位英國人。像這類街名，書中亦有介紹。

《香港中區街道故事》只詳述十二條街道，當然，值得談的香港街道實不止此數，就是中環一區，仍有很多具歷史性和有趣的掌故的街道，鑒於篇幅關係，唯有待日後再予讀者介紹。不過，本書提及的街道在中區亦有一定的代表性，發生在它們身上的故事亦充分反映了香港街道命名的法則、俗名的起源以及中英文街名異譯的由來，並局部地呈現了百年香港歷史的發展痕跡。

梁濤

1988年6月20日

般咸道、文咸街與第三任港督

一個港督幾種譯名

般咸道的路牌，已由從前的“般含”改為“般咸”。把“含”字改成文咸街的“咸”字，但又不把“般”字改回“文”字。照理，般咸就是文咸，因為這兩條街道的命名，是用來紀念第三任港督 Bonham 的。既然從前名般含道可以改成般咸道，何不把譯名統一起來，譯回文咸道呢？

在中文合法化的今日，中文譯名應該統一。第三任港督的中文名有不同的譯法，這是從前不重視中文的師爺的陋習。現在似是改變這種不重視中文的陋習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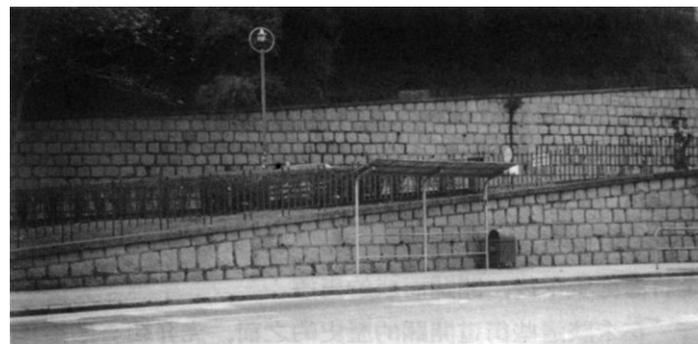
般咸道是在中環半山區，這條馬路連接堅道，起點在樓梯街口。文咸街分文咸東街和文咸西街，是在上環街市附近。文咸西街又稱南北行街，因為街口有座南北行公所，街上又有很多經營南北貨物的行莊。

文咸東街其實只稱文咸街，因為根據屋宇地政署測繪處於 1988 年出版的《香港街與地方》(*Hong Kong Guide Streets & Places*) 所載，文咸東街的英文名稱為 Bonham Strand，並沒有東字，而文咸西街，

第三任港督文翰。中區的般咸道和文咸街均以其名字命名。



昔日文咸街路邊，常見勞苦大眾利用休息或待聘的時間，圍玩潮州四色紙牌。



圖為般咸道之一段，對上是香港大學校址。

般咸道、文咸街與
第三任港督

才加一個 West。但 Strand 這個字，是海濱之意。可見文咸東西街從前是海灘，是將海灘填平後，開闢而成的街道。

在談這些街道開闢的歷史之前，先介紹香港第三任港督的歷史。般咸的英文全名為 Sammel George Bonham (1848—1854)¹，他另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做文翰。

般咸是 1848 年來香港上任的。當他來港之前，上任港督戴維斯 (John Francis Davis, 1844—1848) 返英，告訴他耆英曾許諾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廣州城，故般咸來港就職後，即部署和兩廣總督談英商入城問題。

原來耆英在 1848 年 2 月 3 日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

1 括號內的年份，係指其港督任期，下同。——編者注

月二十九日)奉召返京，兩廣總督一職，由廣東巡撫徐廣縉署理，當般咸來港時，徐廣縉已正式授命為兩廣總督，並授命為欽差大臣。徐廣縉在處理黃竹岐案時，用一命一抵的古老方法緩和了中英關係，因此在般咸眼中，認為徐廣縉是個溫和派，容易解決英商入城問題，但他要找一個適當時機提出。

這時機終於給他找到，他接到情報，知道徐廣縉巡視虎門，於是就在這一天，乘坐軍艦到虎門去，作為到廣州去拜會他，而於途中相遇、請他到自己的旗艦去談談。關於這件事，梁廷枏《夷氛聞記》記云：

時夷酋文翰已代德來駐香港數月矣。聞廣縉巡歷海口，思乘其出劫之於舟，俾險浪驚心，倉卒間必踐夙諾，較以文爭易，而不慮再有遷延也。

所謂文翰，就是般咸；德，就是戴維斯。所謂“劫之於舟”，只是當時士大夫們的看法，實則是藉這個機會，和徐廣縉在軍艦上會談，比較在廣州會談較為有利而已，並不是把徐廣縉劫持到軍艦上來。但由於般咸突然而至，故含有“劫”的意味。

英商入城 先禮後兵

當時般咸是當作到廣州作禮貌上的拜會，偶然在虎門見到徐廣縉的旗艦，便以禮相請，並不是用武力去劫。故《夷氛聞記》接著便說：

則請廣縉臨其舟，廣縉慨然許之。夷舟方旋內洋，隨行官吏咸謂風濤固不測，且身入虎群，履其啞人之尾，設有變，將奈何？廣縉曰：“若輩慮彼敢遮留我乎？留我不有水師提督在乎？因語提督洪名香：若我留彼舟不還，可悉舟師攻之！我自自處，勿以我故，遲疑投鼠忌器也。”言已，欣然棹扁舟，越重礁險澳，乘如屋巨浪，跨登夷船梯二十餘級，至其船樓。

當時般咸的確是以禮相待，他和徐廣縉握手，然後請他到會議室去，和他詳談。般咸先談的是英國貨物的入口稅問題，最後才談入城問題。他說中國既然答應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城，現在兩年之期已到，應該定期履行諾言了。但徐廣縉的外交手腕也很圓滑。《夷氛聞記》記下他對般咸所說的話：

者相之許爾，在我來粵之先，我來未奉詔諭，何能妄予爾期？

就是說，他把責任推在耆英身上，說耆英答應兩年後准許英商入城，但他不知道，又未接到皇帝的聖旨，怎能定下入城之期呢。

般咸也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家，他說耆英目前在北京，可以立即將我的意見，向道光皇帝陳述，叫他詢問耆英，請准英商入城的日期。

般咸初時以為徐廣縉容易對付，不料交過手之後，方知他的外交手腕比耆英還老練些。徐廣縉見般咸建議立即向道光皇帝請准定期許英人入城，便說可以照辦。不過文書往來，需要一些時日，請閣下耐心等待皇上覆旨可也。般咸立即又知道入了圈套。因這樣一來，以後徐廣縉就可以推說未接皇帝聖諭，長期的推諉下去，豈不無法反駁？

於是般咸就提議，叫徐廣縉將奏章交給他，由他用兵船送到天津，替徐廣縉遞交北京。徐廣縉又認為有違法制，加以拒絕。關於當時兩人談判的情形，《夷氛聞記》載云：

文翰以為緩，願自備火輪，舟出粵洋抵津代遞。廣縉曰：“奏摺拜登，本朝自古定制，沿途所過關津驛站，各定時刻，皆有專官，處分甚嚴。安敢違制？以進呈請旨重件，輕付外國，罹譴責。且汝舟近日又安能至天津乎？爾居粵地，一切當遵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文翰語塞。即送出，仍下小舟，騎浪還虎門。

虎門談判的情形就是這樣無結果而散，般咸亦只好乘軍艦返回香港。香港的英商聽到還沒有定出入城日期，自然大為失望。其實在國與國之間，只要貿易仍在進行，而商人入城與不入城，那是小問題，何況當時英國已佔有香港，又在上海有了基地，因此這問題是不重要的。

儘管般咸本人亦知入廣州城是小事，不過，他卻受到在港英商和在華英商的壓力，不能不幹這件小事。前任港督戴維斯正是因為處理這件小事而得罪了滿朝文武。他不想蹈這覆轍。因此他返港之後，立即派當時的陸軍司令乍畏到廣州去，繼續用“炮艦外交”來威嚇徐廣縉。

這個乍畏將軍，就是蘇杭街昔日以其名字命名的那一位乍畏。他在中國文書上另有一個名字，稱為“贊臣”。《夷氛聞記》云：

夷酋自意來有成約、耆英方在朝，當陳明在粵訂約緣由，計無不得請。即未遽允，亦必請督撫酌量現在情事，以定可否。我請已堅，微露強人之意，大皇帝縱不欲逆民志、官又何詞可以卻我？故自陳請後不復喋喋，但自為數日計程，盼摺回如望歲。稍愈往返程程三二日，即令副兵目日贊臣者，輕舟入夷館，探聽消息。

當時香港的政制，仍有副總督之設，副總督多由

陸軍司令兼任，故稱“副兵目”，贊臣即乍畏將軍，他當時是陸軍司令兼副總督。

乍畏將軍到了廣州，聽候徐廣縉的消息。首先，他打聽徐廣縉到底有沒有向道光皇帝奏明這件事。當時的十三行買辦以及商人，都是供給情報的人，英商的消息是十分靈通的。何況當時廣州有一位專拍外國人馬屁的柏貴，這位柏貴，就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出任傀儡政府的人。此人當時在廣州任督糧道，當般咸和徐廣縉在虎門會談時，他也同行。有一本名叫《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的書，著者名“七弦河上釣叟”記虎門會談的情形，可補《夷氛聞記》不足，該書提到柏貴參與其事：

廣縉單騎往，從行者督糧道柏貴，中軍副將崑壽。既至，登夷舟，英首邀入艙，柏貴崑壽坐艙下。廣縉見英首為指陳利害，英首敦迫再三，廣縉執不可，聲色愈厲。二人聞而起視，夷奴阻之，崑壽盛氣相向，遂卻走。

這是柏貴初次和洋人打交道的情形，他顯得很軟弱，不及崑壽的理直氣壯。他後來當了英法聯軍在廣州成立的傀儡政權的“首長”，並非偶然。

乍畏將軍在廣州收集這些人的情報，知道徐廣縉確實向道光皇帝呈上了奏摺，並且還知道奏摺的內容。當時徐廣縉的奏章有一段寫道：



般咸道、文咸街與
第三任港督

蘇杭街因遍佈絲綢匹頭店舖而得名，其英文名稱“乍畏街”過去曾經是正式街名，下圖可見該處一些店舖、商會還照用“乍畏街”的名稱。

該首既鋌而走險，借進城以圖利，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若止在廣東滋擾，尤可竭力捍禦。倘鳧舟江浙，則柔脆之民，勢難堪其蹂躪，且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恐沿海均難免風鶴之驚。

他的奏摺最後表示：“臣實已智盡能竭”請求皇帝“指授機宜”。乍畏將軍對徐廣縉這樣的奏摺，覺得頗為滿意，深覺徐廣縉弄清當前的形勢。事實上英國的炮艦，可以在茫茫巨浸，滋擾沿海各地。

當時般咸的政策是：派乍畏將軍長期駐在廣州，以炮艦泊於珠江，做成軍事優勢；一面他在香港，以全權大使的身份，和徐廣縉作文書往來，這樣就可以把來自英商的壓力消除。

乍畏將軍不久就得到徐廣縉的答覆，徐廣縉把道光皇帝的聖諭讀給他聽，乍畏將軍聽了大為不悅，因為其內容非常空洞。如下面這一段聖諭說：“民心即天心，在彼重洋來斯，更不宜與民頡頏。念萬里貿易，官吏當隨時為其保護貨物。”又怎能令乍畏將軍滿意？

乍畏將軍把這情形向般咸報告。香港方面的英商，原以為皇帝下旨訂定入城日期，但如今得到的回覆卻是空洞的言詞。於是，便叫囂要攻打廣州城。那些在南洋及印度經商的商人，滿腦子是殖民主義思想，認為只有用武力，才能解決入城問題。又向般咸施加壓力。

般咸為了緩和這種壓力，於是派更多的炮艦到廣州去，表示真的要攻打廣州。他訓令乍畏將軍，叫他口頭上對徐廣縉說：“不要敬酒不飲飲罰酒。”但這一來，卻激起廣州人民的憤怒。

廣州人民看見英國炮艦越來越多，對方確有攻城的企圖，於是立即組織起來。當時，發起組織的是知識分子。廣州那時有三間書院，一名粵秀書院，一名羊城書院，一名越萊書院。號召組織起來的學生和教師，便是來自這三間書院。

《夷氛聞記》的作者梁廷枏當時也聯同廣州紳商去見乍畏，他在《夷氛聞記》裡記述當時的情形說：

會紳士恐夷酋尚未深悉利害，頓成糾結，集繕公函，語以民間設勇事，使通事齎書至領事所，令轉致文酋。適副目入探，時方集舊洋樓，領事正寓其鄰，慮書詞彼不克暢明曲折，即令傳語領事，將親至曉之，令勿先避。領事迎入，招副夷目圍案而坐，遂悉舉今昔情事之不同者正告焉。副目領事並唯唯。

至於彼此見面時的細節，書中有如下的描寫：

時同登者七八輩，領事接入，有握手為禮者，予但遙揖之，辭亦一拱而行。初至，各尚齒，圍圓桌而坐，領事偕副兵目及一幕友，三人雜坐其中。出茶敬客，次葡萄酒，次則